

（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研究报告】	文革“斗争会”（二）	王友琴
【当事者言】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上）	徐景贤
【千秋功罪】	我父亲王飞不后悔被定“林彪死党”	王鲁宁
【史海钩沉】	造反派的末日	叶曙明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研究报告】

文革“斗争会”（二）

• 王友琴 •

（上接 二、“斗争会”结构和要素，zk1412c）

3，怎么“斗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侮辱和折磨

在“斗争会”上，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这“斗争”到底指些什么行动，只有在对“斗争会”的实际考察中，才能真正了解。

（1）罚站和低头

“斗争会”设立了一套对被“斗争”的人的身体的惩罚方式。罚站和低头是其中最“轻”的。被“斗争”的人站立而且低头，以表示“低头认罪”的意思。“低头”后来又发展为被“斗争”者要弯腰90度。

罚站也并不容易承受。北京大学生物系胡寿文老师告诉笔者，生物系老一点的教师，百分之九十都挨过“斗争”。打耳光是“家常便饭”。有一天生物系老教授赵一炳悄悄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在“斗争会”上能站得住。胡寿文告诉赵教授，应该多换脚，先站在一只脚上，再换到另一只脚上。三十年后他才想到，赵先生怎么可能连换脚都不知道呢，这是凭人的本能就会知道的，站久了，就倒换双脚。赵教授当时60多岁（赵在19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他自己30多岁。现在他也到了那个年纪，才体会到了老年人被“斗争”遭受的苦楚更大。

北京大学生物系崔芝兰和张景钺教授是夫妇，分别在德国和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文革时已经六十多岁。有一次他们在家门前（北京大学教员宿舍）被“斗争”，脸上涂了浆糊和墨汁，身上挂了黑牌，有人揪他们的头发进行辱骂。张景钺有帕金森病，文革前就已经卧床不起。“斗争”

他们的人让崔芝兰教授跪在地上，支撑张景钺站立着被“斗争”。

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是一级教授，“反动学术权威”，文革中常被“斗争”。建筑系女教师陶德坚（1932—1997）描写了其中1968年的一次：

梁先生久患肺气肿这个难治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根本无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轮车拉来的。批斗会上，他蜷曲着身子扒在平板车上，我作为陪斗就站在他的身旁。我清楚地听见他的喘息声，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到他那嘶嘶的哮喘声越来越沉重，我的肺好像也要爆炸了。但没有人管这些，发言批判他的人，照样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揭发批判。只有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的气喘声。我跟着他难受，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挨到散会，梁先生又被原车拉走了。（陶德坚回忆录《风雨人生》，页139—140，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1997）

由于已经不能站立，罗瑞卿被装在一个大箩筐里拎到“斗争会”上。他曾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军队总参谋长，是文革中最早遭到清洗的高层干部之一。他在1966年3月18日跳楼未死摔断了一条腿。1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当时最大的集会场所）“斗争会”上，当时有观众不知道他早在3月就被撤职并跳楼伤了腿，还问别人，为什么把他放在箩筐里？因为他姓罗？

更悲惨的例子是西南师范学院文学教授吴宓。1969年5月9日，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梁平分校挨斗，被两名高大的男生挟持疾行，腾空甩出，右腿扭折成三截（大腿向内，小腿向外，膝盖和胯骨两处脱臼），仍勒令半跪半坐三小时，听完革命师生批判。”（《吴宓日记续编》页2，编者吴学超“前言”。北京：三联书店，2006）

上文提到的八岁时被“斗争”的女士说：她被她的同学“斗争”时，觉得最痛苦的是两件事：一，他们要她“低头认罪”。一个大她两岁的小学生（10岁）过来按她的头（小学生已经学会了怎么“斗争”人，因为示范到处可见），她低了头，又很快把脸侧向一边，自己觉得好像这就算没有低头（小孩子也已经知道了“低头”所含的“认罪”的严重涵义）。另外一件事是她怕她妈妈知道了一定会不得了，因为她“惹祸”了。

## （2）“高帽子”和“黑牌”

高帽子：一种用纸或者其他材料制作的至少一尺高的尖头帽子。“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的一张照片上，一大群戴着白色尖头高帽子的人站在一起，后世的人乍一看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有的高帽子上写有“罪名”，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侮辱性和政治含义。高帽子如果用纸做，不会很重，但是1966年6月17日兰州大学“斗争”校长江隆基时，让江隆基跪在层层相迭的桌子椅子上，还给他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江隆基在一星期后“自杀”身亡。

黑牌：写着被“斗争”者姓名和罪名的大牌子。姓名上还仿照古代的死刑犯打上了红叉。“黑牌”一般是用马粪纸作的，但也有人故意用很重的材料，并且用很细的铁丝穿起挂在脖子上。北京第一中学靠着北京城墙。1966年红卫兵“斗争”女校长刘启明（女）的时候，用铁丝把一块城墙砖挂在她的脖子上。北京语言学院院长王亦山，跪在大会台子上被“斗争”，脖子上挂了一块砖头，两边跪着“陪斗”的人。

## （3）“阴阳头”

被“斗争”的人中很多都被剃去半边头发，看似“阴阳”图案，故被称为“阴阳头”。这主

要用于女性，例如，学者、作家和翻译家杨绛，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冯仲芸，这样的人本是大众心目中的文雅女性形象，在1966年都被剪了“阴阳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甚至把多名“坏家庭出身”的女同学也剪了个“阴阳头”。被“斗争”的男人则被乱七八糟剪掉头发。《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李振盛拍摄了该省省长李范五在“斗争会”上被女红卫兵剃头发的一组照片，好象动画片一样展现了剃头过程。省长（李范五）是大人物，有摄影记者照了相。其他被剪“阴阳头”的人很多，但没有照片留下。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一名学生买了一把理发推子（当时四块多钱是个大数），把十几个被挂了“黑牌”的老师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还让他们每人交给他五毛钱“理发费”。

中国之大，以上三项到处发生，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有特别的恶方式。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中学，那里的“风俗”是要被“斗争”者背一个稻草人，上面标有其姓名。这个学校只有初中，有三十个教职员，两名被迫害致死。教员受访者说，每次听说要开“斗争会”，前一天他就要他的八岁的小儿子去悄悄地看，准备好的那些稻草人中有没有他的——自己第二天会不会被“斗争”。

#### （4）“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一种“斗争”姿势是强迫被“斗争”者跪在或者趴在地上，让红卫兵在其身上踏上一只脚，以实践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章（1927）中所写的，把乡村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一张照片是上海美术学校和戏剧学院联合召开的“斗争会”。这两个学校是近邻。照片的主要人物是红卫兵，他们占据了画面的中央和大部分，挺胸抬头，高扬的手中举的是毛泽东语录本，同时都伸出一只脚，踩在匍匐在地上的被“斗争”的人身上。这些人是他们的老师和学校的负责干部。提供照片的人说，这是当年开红卫兵造反展览的时候展览过的。那也就是说，当时是被作为“功绩”来表彰和炫耀的。

类似场面也发生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966年8月的一天红卫兵非常兴奋，因为《北京日报》记者来学校照相。他们摆好一张方桌，命令副校长刘美德（女，化学教师，36岁）跪在桌子上，一个红卫兵站在桌子上，挺胸昂首，把一只脚踏在刘美德背上。摄影记者站在地面上把这幅图景照下。照相之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踹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当时在场的一些女学生吓得闭上了眼睛。刘美德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这张照片后来没有在《北京日报》发表。一名该校的受访者说，假使这张照片发表了，恐怕北京的中小学教师会有一半会被斗死。（笔者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

#### （5）“坐喷气式飞机”

很快，更普遍和流行的“斗争会”姿势是“坐喷气式飞机”，尤其是在大型的“斗争会”上。被“斗争”者身后站立两个红卫兵，把这个人的头按下去，把其手臂往后揪起来，使其身体成为“喷气式飞机”的样子。

一名受访者说，他被“斗争”时，站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的旁边。他说，彭佩云个子矮小，做“喷气式”状，身子弯下来，“整个人像被对折了一样”。他自己也弯腰低头，只看到彭佩云汗珠连着滴落在鞋子上，尽管当时不是夏天。

文革后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革中也遭受过这种“喷气式”。1967年初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斗争”胡耀邦，两名中学生红卫兵各揪住他一侧后脖颈，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喷气式状押到主席台上。在胡耀邦身后架着他成“喷气式”的红卫兵之一（当时20岁）说，

他们都觉得累，每20分钟要换班。

北京大学俄语系讲师龚维泰，1968年被指控为“叛徒”（因为他在中学时参加过一个共产党的青年组织，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很快就释放了。释放而没有被枪毙，就是“叛徒”的“证据”和被“斗争”的“理由”）。一名受访者说，龚维泰在俄语系被“斗争”时，两个学生在他后面反拧着他的胳膊，他低头弯腰90度角，形状如喷气式飞机。他身后揪着他手臂的学生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11月7日半夜里，龚维泰用刮脸刀片割断腿上动脉死亡。时年37岁。当时他和系里的老师一个挨一个睡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的水泥地板上。他的血流淌在地上，很快被用拖把蘸水抹去了。其他老师则在他的空出的位置旁边继续睡了几个星期才被允许回家睡觉。

据说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运用这种姿势“斗争”地主的时候，用的名称是“燕飞”。到了文革时代，那时的中国人其实也只是听说过“喷气式飞机”而几乎都没有乘坐过飞机，即使在大学里也如此。但是对“斗争会”上的“喷气式”，却几乎人人见过，也都知道这个特殊名称。文革中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的人数远超过了坐过真飞机的人数。除了残忍和野蛮，这也是非常讽刺性的事情。

#### （6）殴打

1966年6月18日，在全面停课18天之后，北京大学校园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性“斗争”。有数十名教师和干部被抓到学生宿舍门口的台阶上被殴打，罚跪，撕破衣服，等等。有学生把一根绳子套在胡寿文老师脖子上拉去“斗争”。他跌倒在地，尽力抓住绳子，才没有被勒得窒息。中文系的学生把厕所里的大便纸篓扣在系负责人程贤策、向景洁头上。历史系教师俞伟超被挂了“黑牌”并被打，一个和他大学同班并一起留校教书的同事也打了他一拳，尤其使他悲愤。他回家跟妻子说：他宁可“劳教三年，也不愿被批斗一场”（“批斗”是“批判和斗争”的缩略说法）。6月22日一天内俞伟超三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先触电后上吊再卧轨。他幸而未死，但是两手的食指被电流击伤坏死，身体被火车头铲出铁轨受了重伤，两腿变得一长一短。缺失了食指的双手和瘸腿伴随他终身。（1985—1998年他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但是他从未撰文写出他自己的这一段“历史”。）

7月2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到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中“斗争会”上被打死。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文革中第一次百万人大集会庆祝文革。北京最早打死人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领袖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袖章，听她说名叫“彬彬”后，毛泽东说“要武嘛”。会后，暴力迅速升级，殴打成为“斗争会”上的普遍情况。8月19日晚上，北京四、六、八三所中学红卫兵在紧邻天安门城楼的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三所学校的校领导以及北京教育局和共青团市委的领导干部。红卫兵在音乐堂的舞台上用军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斗争会”后又把这些人的押到台下“游街”，过道两边的红卫兵纷纷出手打他们。最后把被“斗争”的人装上卡车送回市委，北京市共青团委书记汪家璆（女）被踢下卡车，当即昏死过去。

8月20日上午，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操场上召开全校“斗争大会”。学校领导人和一批教师数十人跪在地上遭到毒打。中午时候，校长沙坪死亡。（1996，2010，2011年访谈。）“斗争会”本来计划下午继续进行，因沙坪死亡停住。笔者访问过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的两名女士，听他们讲述了悲惨的细节。

8月下旬，北京第27中学（原名“孔德中学”）外号“四阎王”的四个女红卫兵，在教室

里“斗争”一名初二的女学生，她的罪状是把小红书毛泽东语录坐在身子底下。惨叫声传到门外。学校的一名工人来劝，“别打了”，红卫兵根本不理。这名女学生被打死后，这四个红卫兵为了判断她是否真的死了，还把碎玻璃揉进她的眼睛，看到她没有反应，才罢了手。在北京大学附中，初中一年级女生万红的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她的同班同学命令她站在一个凳子上，他们“斗争”（谩骂加殴打）她以后，把凳子踹倒。万红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当天晚上宿舍房间不准她睡在自己的床上，命令她在阳台上淋雨。

不要以为这样的“斗争会”只是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的“胡闹”。在党的上层机关也一样。在1966年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召开第一次全部性“斗争会”，“斗争”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会场在二楼大礼堂，并拉线向全楼广播实况。孟用潜和十多名“陪斗”的人跪在台子上。会前给孟用潜预备了写有“三反分子孟用潜”的高帽子，帽子里藏有图钉，帽子压到他头上血就流下来。（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页28—29）外交部里没有年轻学生红卫兵，主持开会的是副部长乔冠华，一直被说为中国“最有风度的外交家”，却用这样野蛮下流的方法“斗争”自己的党内老同事。8月18日，毛泽东和很多中央级领导干部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广场上的红卫兵，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也身列其中。但回到党校，他也被“斗争”，敲着装垃圾的铁簸箕“游街”。8月24日，《人民日报》在五楼大礼堂开“斗争会”，前主编吴冷西等跪在台上，遭到拳打脚踢，吐唾沫等等。原文艺部主任、杂文作家陈笑雨在“斗争会”结束后，没有回家，径直到玉渊潭投水身亡。对于圈外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这些野蛮的景象；而实际上发生的，只可能比报告出来的更加卑劣。

暴力性“斗争会”在全国传播。当时上海的一名女红卫兵告诉笔者，1966年8月或者9月的一天，在人民广场红卫兵“斗争”一个男青年，说他是“流氓”。她也过去用绳子抽了一下。这个人被打死了。其实她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暴力从北京发展到边疆省份。何洁夫是北京农业大学职员，妻子高无际是该校会计。高无际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何洁夫则被指控有“历史问题”。1966年9月红卫兵在北京发起“遣返”城市人口中的“阶级敌人”到农村，他们和两个孩子被驱逐到了广西玉林专区容县杨梅公社成美大队。一年多以后，1967年11月14日，公社召开“斗争会”，有二三十人在台子上被“斗争”殴打。何洁夫的妻子和孩子在台下看着他被用木棒打死。他被打死后，两个孩子（男孩子14岁，女孩子18岁）被叫上去抬死尸。一名本家何厚业帮助他们抬了尸体。看到被“斗争”的人大多已经被打死，少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何厚业随后捆上了自己的手投河身亡，因为他会游泳。（2002年访谈）

### （7）“游斗”

大多数“斗争会”是在一个固定场所进行的，但有一个变种叫“游斗”，即很多人聚在一起，一边移动一边“斗争”。1966年8月11日，江西南昌师范学院“游斗”140多人，历时三个多小时，最后来到学校中心的“红场”，命令被“游斗”的人在那里跪下继续被“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多人昏厥。中文系副教授熊化奇、老教师黎仲明和医务所医师周天柱当场死亡。历史系教授何基被“斗争”后在夜里“自杀”身亡。

福建省的一名受访者说，厦门话把“游斗”称为“巡回”。1966年8月13日，厦门第八中学，50多岁的语文老师萨兆琛再次被自己任教班级的红卫兵“斗争”。他们给萨老师戴上写有罪名的高帽子，在他胸前挂着又大又重的打了红“X”的木牌，连教室里的双人长条板凳也给他背上，押着他从教学大楼一楼到四楼，到每个教研组“斗争”，最后带到北望楼操场“批斗”。萨老师负重几十斤，又被逼抱大石头下跪。几次晕倒，红卫兵不断地向他泼冷水。萨兆琛是文革中福建省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老师。

在北京大学，最大规模的校园“游斗”发生在1968年6月18日。上文写到1966年6月18日的暴力性“斗争会”遭到刘少奇的制止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所以在两周年的时候用更大规模的“斗争会”来“纪念”和“庆祝”。两百名当时被关在“黑帮大院”里的教职员被押解出来。纵贯校园南北的甬道两边有两道人墙，那些人拿着棍棒竞相殴打中间走过的“牛鬼蛇神”。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的眼镜被打落，他高度近视离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幸亏身旁的朱德熙老师连忙从地上捡起眼镜给他戴上。朱德熙被打得满脸流血。整个北大校园里弥漫着邪恶的狂喜。“游斗”之后，“牛鬼蛇神”被分到各系“斗争”。西语系教授赵萝蕤被两名女助教架着，她们往她的膝盖后面一踢，赵萝蕤就跪倒在地上。有人搬来砖块，一块接一块叠放在跪着被“斗争”的人的背上，如果背不稳掉下来，就挨打。有一名学生（姓名不提）拿一片竹篾，在英文教授吴柱存脖子上用力一旋，旋去了一圈皮，疼痛至极。吴教授说，他是独生子，从小没有被父母打过，长大在学校里是好学生，到美国留学后回国教书，一辈子从来没有被打过，没想到文革被学生打成这个样子。（1998年访谈）。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西安、南昌、长沙，都有过全城规模的“游斗”。各单位把他们那里的“牛鬼蛇神”放在卡车上。他们的头颈上挂了写有姓名和罪名的牌子，姓名上都有红色大叉子。卡车编成长队，缓缓开过城市街道。卡车上配有高音喇叭，一路广播呼口号“打倒XXX”。马路两边站满观众。这样的“游斗”，因为被“斗争”的人多，车队很长，观众很多，过程可以长达数小时。一名当时住在南昌的初中学生说：1968年秋夏间，全城大游街，她也挤在街道两旁的人群中，她是来看她的已经被关押半年多不准回家的父亲的。她希望即使在这种情景下，在被“游街斗争”的情况下，也要见见父亲。等了很长时间之后，人群中有认识她的同学发现了她，骂她是“狗崽子”，把她推来搡去，结果，在混乱中，载有她父亲的卡车开了过去，她没有见到父亲。她不记得那天的确切日期，只记得是在她10月份被“下放”到农村之前。

湖南中医学院教员娄瘦萍因其15岁的女儿随舅舅想要逃出中国，在1968年被逮捕。1970年9月27日长沙召开全市性万人“公判大会”判处他15年徒刑。这种“公判”不经过审判程序，也不引用法律条款定罪，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公判大会”后把被判的人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判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两年未见的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1974年1月娄瘦萍死于劳改营中。他早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是很好的外科医生和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死于监狱中。女儿被判刑十年，舅舅（牙医）被判死刑。

在云南西双版纳，1968年流行一种“斗争”方法名叫“打落水狗”。“不打落水狗”是一句古老的俗语，意思是如果对手已经被打败（落水），不要继续再打，给人留有余地。而这种“打落水狗”的“斗争”在意思上反其道而行之，对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还要继续打，同时还把原来的比喻变为实在的行动。西双版纳地区多水塘。“打落水狗”是真的把被“斗争”的人打到水塘里面去。被“斗争”的人被打落水后，“斗争”他们的人则围在水塘边吼叫欢呼，看他们在水里狼狈挣扎。这是根据地理条件而“发明”的“斗争法”，对身体的折磨和对精神的侮辱则和其他地区一致。

#### （8）“大批判”：所谓“文斗”

“斗争会”还有一个构件是“大批判发言”。因为这种“发言”，文革“斗争会”也常常被称作“批斗会”，意思是“批判”加“斗争”。“批判”是用文革的理论对“斗争”对象进行口头攻击。这和上面写的人身侵犯有所不同，所以被称为“文斗”，和攻击身体的“武斗”相对应。

发言人一般是事先安排的，讲稿也是事先审查过的。“大批判发言”中的话，都是从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上抄来的。那为什么还需要开“斗争会”呢，显然是因为可以通过当众侮辱折磨和殴打被“斗争”的人身体，来强迫所有的人接受那一套文革理论和说辞。一般来说，身体暴力比语言暴力的作用直接得多，也更具伤害力。站在文革领导者的角度看，“斗争会”二者并用，能最大程度地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需要指出，这些口头侵犯因为粗暴无理，所以必须有侮辱和殴打配合，才能达到效果。例如，上文写到北京大学生物系崔芝兰和张景钺教授夫妇被“斗争”时，让崔先生跪在地上用身体来支撑张先生站立。当时新华社的文章说，北京大学的人回想以前“整天穿着白大褂，拿着试管在高级实验室里研究什么蝌蚪尾巴、果蝇遗传等，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见1970年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蝌蚪尾巴是崔芝兰曾经做过的研究项目。果蝇研究已经是遗传学的重要成果并且写入了当时的中学生物课本。这两项研究被并列指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和刘少奇挂钩。这样荒谬的“大批判”，只有在暴力手段的配合下，才可能畅通无阻地发表并流传全国。要不然，连中学生都会笑话这种谬误。这种情况也让我们不但理解“斗争会”的基本构件，也让我们理解这几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 （9）怎么被“斗争”？

以上写的是“斗争”者的行为。受访者指出，“被斗争者”不但被“斗争”，还必须“配合”“斗争”，否则会受到不可预测的更严厉的惩罚。

“斗争会”上发生的肢体反抗或言语辩驳的例子几乎没有听说过。作家萧军在1980年告诉笔者，1966年8月23日下午他和老舍等作家、演员在北京文庙院子里被“斗争”时，他们被迫围绕火堆跪下，火堆燃烧着京剧戏装和书籍之类所谓“四旧”，身后的几百个红卫兵用棍子劈头盖脸地打他们。老舍先生跪在他旁边，脸色煞白，血从额头上流下来。萧军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和老舍性格不同。他说，他当时很想动手反抗，他认为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当然自己最后寡不敌众会被打死，但是其他人像老舍先生，也一定会同时都被打死。他强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他活下来了，而老舍先生在第二天投湖身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员说，系里的戴家祥教授（1906—1998）在1957年就划成“右派分子”，到文革时被称为“老运动员”（这是文革时代少有的“黑色幽默”之一）。1966年，随便红卫兵怎么打骂羞辱，他都不反应：面无表情，一声不响。他遭打比别人更多。他不懂红卫兵的心理，红卫兵期待有反应，要看到被“斗争”的人表现恐惧和屈从，要他们说“我有罪，我该死”，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看到戴家祥不反应，红卫兵威胁要把他扔进河里。他这才哀告，红卫兵也才得到了满足。

在北京大学从1969到1970年的七个“宽严大会”上，每次有人被“从严处理”，但是也有很多人按照安排上台发言认罪，而且还认并不存在的“罪”，并且“感谢”“党和人民”对他们的“宽大”。这样“表演”之后，他们得到“从宽处理”，即不被定为“敌我矛盾”和不被戴手铐送监狱。

#### 4，“斗争会”其他附件：崇拜和仇恨

下面三项是“斗争会”一般都有的。但是当时别的集会也一定有这三项内容。所以把这三项列为“附件”。

开会时第一项总是台上的领导人先大声说：“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台下的“革命群众”挥动小红书毛语录响应，大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1971年9月林彪死亡后这一项被取消。）在湖南省津市澧澹农场（劳改农场）的一名青年囚犯，原是工厂工人，在“敬祝”的时候，故意把“永远健康”说成“永远吃糠”（湖南话把“吃”读作“掐”音），而且得意地告诉了伙伴，结果被判刑入狱。

接着朗读毛泽东语录，当时称“最高指示”。在1966到1971年林彪死亡之前，毛泽东的小红书是人人必须随身携带的。“斗争会”上必诵读的语录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等等。

另一项是呼喊“革命口号”。除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有会必呼的口号之外，还有大量的“打倒XXX”（被“斗争”者名字）的口号。“斗争会”上有两个句式复杂而冗长的常用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前者是苏联作家高尔基在1930年发明的。（见麦德维捷夫《让历史来审判》一书1989年增订本英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从笔者看到的文革时期资料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最高领导人中排名第五）是最早使用这个口号的人（1966年12月）。这个口号常被呼喊，虽然只有郭沫若在作了“投降”后免予“斗争”，其他人“投降”也仍然被“斗争”。至于后者，看起来全属中国制造。

## 5，不是“表演性审判”

把文革“斗争会”和其他迫害性仪式作比较，会有助于认识和说明“斗争会”的特点。斯大林同样对俄国人民进行过大规模的迫害，也对他的干部做过残酷的大面积清洗。在斯大林的迫害手段中，有一种被称为“表演性审判”（show trial）。例如，1938年以“叛国罪”判处苏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布哈林死刑，举行了“公开审判”，还通过无线电收音机转播实况。但那不是真的法律审判。判决书是审判前就写好的，出庭作证的“证人”公然作伪证，被告为了让妻子孩子活下来只好“认罪”。所以这类审判被称作“表演性”的。

据后来的揭露，在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上，那些起初拒绝配合的“证人”在庭下遭到了身体折磨如殴打等，所以被迫作伪证。但是这类身体折磨没有像文革“斗争会”那样公然把侮辱和殴打展览给人群观看，是在幕后偷偷地做的。文革的领导者们根本不曾费心去“表演”一场审判，他们只是召开了不计其数的“斗争会”。

“斗争会”中没有法庭审判程序，哪怕是假的或者装样子的都没有。“斗争会”在事先就定好了被“斗争”者的罪名，写在他们的“高帽子”“黑牌”以及大会的横幅上。“斗争会”上不准被“斗争”的人作自我辩护。也从来没有“证人”出现在台上。“斗争会”上的发言是“大批判”而不是“证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住地“中南海”遭到“斗争”，后来在监禁中死亡，但是从来没有受过审判。文革期间有时也有由“政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的“公判大会”，对“现行反革命犯”宣布死刑或者长期监禁，那也只是宣布判决，完全没有审判过程。由此可见，文革迫害比斯大林走得更远。

不做“表演性审判”的原因显然和文革中反复强调的上文已经解释过的“两个决裂”有关。审判，依照法律判决，等等，显然属于要与之“决裂”的“传统观念”。有的东西，比如货币和商品生产，文革领导人想要废除又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因而没有实行，但是废除“审判”程序，他们非常容易就做到了。



“斗争会”和“表演性审判”的相似处只在于其目的都是迫害一部分人，以及都通过一套固定的程式来实现这种迫害。相当讽刺性的是，中国官方结束文革的方法之一是审判“四人帮”，而那个审判确有“表演性”，因为预先安排并做过“彩排”，包括在急忙中制定了一部“刑法”然后在1981年1月开庭审判。但是对“四人帮”的审判在其作用上说是结束文革和惩罚文革作恶者，和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作用不同。另外，那场审判多少也在程序上是按照法律进行“审判”的开始，法庭上出现了证人和被告的辩护律师，被告也作了自我辩护。

（未完待续）

~~~~~

## 【当事者言】

###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上）

• 徐景贤 •

〔编者按：本文为徐景贤《最后回忆》第五章，本刊 zk1412c 所载“我见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为徐景贤《最后回忆》第四章，被误植为第五章，特此更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张春桥处理完“安亭事件”回到北京去了，我在上海又感到彷徨起来：我怎么办？我们市委写作班怎么办？……

张春桥在上海总共只逗留了两三天，我和他只在文化广场的后台匆匆见上一面，虽然我见证了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历史时刻，但我根本没有机会和张春桥深谈，更不用说向他请示我们这个班子的去向了。即使向他请示，他也只能原则地回答：要到群众中去，要和群众站在一起。这些话十月间他和姚文元在北京见到朱永嘉时就说过了。当时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摸情况，总算见到他们一面，传回来了这样的几句话。我很惶惑：什么样才算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呢？在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接待北京红卫兵，或是在市委机关延安西路大门口值班，显然不能算到群众中去，连“安亭事件”以后我陪同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工人造反派，也仍然不能算和群众站在一起，因为在别人看来，我充其量只是张春桥的一名联络员。

何况，市委仍不断找我，一忽儿要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去处理“漕溪北路”事件，一忽儿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准备为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有时还要让我代表市委领导去文化广场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批判。我感到厌烦和苦闷，内心不愿再为市委做“挡箭牌”，可是我一时又找不到出路。市委写作班的同事们和我一样，大家都知道闭门写作已经不能适应外界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前景不明，人心涣散，历史组“罗思鼎”小组的成员大部分回到复旦大学去了，文学组“丁学雷”小组的青年们也纷纷返回作家协会，大家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分头参加到这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

### ◇ 复旦红卫兵到市委写作班抄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市委写作班发生了一件大事：复旦大学的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求被市委派往北京的朱永嘉回复旦大学参加运动。复旦大学党委报告了市委，市委找我，我就电话通知朱永嘉返回上海。胖胖的朱永嘉，江苏无锡人，原来是复旦大学毕业生，留校研究中国古代史，又是共产党员，担任过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总支委员，分管统战工作和学术研究。一九六四年和几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一起调到丁香花园，后来成为“罗思鼎”写作小组的组长。当时，正值全国学雷锋的高潮，他们写作时就以雷锋的话“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

谐音，取笔名为“罗思鼎”。在张春桥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罗思鼎”小组为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做了许多工作。可是，现在复旦大学的运动深入了，历史系的两派红卫兵为了争夺批判系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把矛头对准了朱永嘉。

朱永嘉回校后，历史系的红卫兵召开大会，批判他参加撰写的、用“罗思鼎”笔名发表的《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论清官〉质疑》等文章是“明批暗保”的黑文，执行的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的路线，并抄了他住在复旦大学宿舍的家，可是抄不到什么东西。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支气势汹汹的红卫兵队伍冲进武康路二号，要市委写作班把朱永嘉的“黑材料”交出来。我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心想我们前一时是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怎么能抄家抄到这里来？我当然要对此负责，不肯交材料。红卫兵看了我们贴在会议室里的批判市委的大字报，说你们写作班是“老保”，专门保市委。他们拿不到材料，就冲上二楼去，把历史组的门强行打开，把朱永嘉等人的办公桌撬了，把所有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原始材料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当时我们认为，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市委写作班居然也成了抄家的对象，而且来抄的是复旦大学的造反派“红革会”，这怎么得了！当天赶来的是郭仁杰，他是山东来的南下干部，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后来调去华东政法学院，大批判过程中又调到市委写作班任党支部副书记和哲学组组长。他当时已从写作班返回复旦大学，是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中造反比较早的，与“红革会”关系非常密切，“红革会”请他当了顾问。现在，复旦大学“红革会”冲到武康路造写作班的反，他也赶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应该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对红卫兵，他也做一点工作，希望他们把抢走的材料送回来。他表示：小将们来抄家事先他并不知道，复旦大学“红革会”也不太了解写作班、朱永嘉等和张、姚的关系，意思是误闯“白虎堂”了，他想对两边做工作起一些调节作用。我埋怨他：你一忽儿装红面孔，一忽儿装白面孔，但是你不想想，红卫兵把批《海瑞罢官》的好多文字材料搞走了，我们怎么向领导交待？我担心资料里面有很多保密的东西，随便搞走外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件事报告了姚文元。

#### ◇ 姚文元来电保护“罗思鼎”小组

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应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迅速和果断：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商量，张春桥感到：名义上是搞市委写作班，整“罗思鼎小组”，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他的。他们都感到事态严重，姚文元表现得特别激动，提出必须马上表态。他们商量以后，决定由姚文元直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写作班。对此，我的笔记本上有着当时的详细纪录：

“二十日晚，姚文元给丁电话（当时我对外都叫“丁学雷”），听说复旦大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反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注：姚文元不提红卫兵，只讲复旦党委）。张春桥、姚文元非常惊讶，关锋、戚本禹十分气愤，戚本禹还说到复旦来贴大字报（注：这是电话原话）。有几个问题你记下来：第一个问题要追根的问题，你话要讲得硬，追根就是应该追到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才是根子。第二，去年十一月份以来，《文汇报》的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的（注：因为《文汇报》搞了《海瑞罢官》的批判，而现在复旦大学要批发表了“罗思鼎”文章的报纸）。第三，朱永嘉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想追到张春桥。（要我记下原话回答他们）你可以转告复旦大学，整朱永嘉是错误的，我跟春桥同志商量了，复旦大学要追“罗思鼎”小组的根子，你去告诉他们好了，根子就是张春桥，根子就是姚文元！我在北京，谁要揪，到北京来揪好了！”

这是我在整个文革期间听到的姚文元的一次最强硬的表态。因为当时复旦大学有些人把贯

彻毛主席意图、为张、姚服务的写作班子，说成是执行了彭真的错误路线，这使张、姚怎么能够容忍？怎么不跳起来？同时，张春桥、姚文元还怀疑是上海市委的某些领导人在背后策动这件事。所以，他们作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而且整个中央文革的“秀才班子”几乎都表态了，一致非常重视这件事。这在后来王力所写的回忆录里也有记载。

我当时接了电话感到很兴奋：姚文元和中央文革的态度如此强硬，对上海市委写作班的评价这么明确，完全可以把写作班和朱永嘉有力地保护下来了。姚文元在电话里还跟我讲，要用“丁学雷”的名义，对复旦大学所有红卫兵说，“罗思鼎”小组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和路线是对头的，跟姚文元的合作是很好的。还要我说，写作班在前一个时期，是张春桥直接领导的，跟杨西光没有关系。那天姚文元给我打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他到北京以后给我打的最重要、最交底的一个电话。他这样说，完全把我们作为张、姚自己的嫡系部队，高度信任，全力支持。

接完电话后，我马上向郭仁杰以及“罗思鼎”小组成员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作了传达，把姚文元电话记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要他们记下来后详细地告诉复旦大学党委和红卫兵。我还在华山路市委接待站约见复旦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向他们宣读了姚文元的来电记录。当时朱永嘉还关在复旦大学，不知道喜从天降。那天我很激动，我感到姚文元代表中央文革的来电，给了我们一把“尚方宝剑”，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

那两天，复旦大学正在召开批判朱永嘉的大会，两派红卫兵都到场，一派是复旦党委扶植的红卫兵，他们也要举批判的旗子；另一派就是起来造反的“红革会”和“红三司”。会议中间，朱维铮和王知常冲上台去，责问保守派追后台要把矛头指向哪里？造反派红卫兵冲了会场。吴瑞武接着在会上一字一句地宣读了我传达的姚文元来电记录，指出要揪朱永嘉、追“罗思鼎”小组的后台的话，后台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后台就是中央文革！这样一来会场大乱，保守派对党委当场反戈一击，批斗会再也开不下去了。

#### ◇ 郭仁杰、朱永嘉陪我到复旦大学“留学”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和复旦大学党委、历史系总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难站出来，张春桥在北京也对他说过：“谅你也不敢造反！”现在，经过红卫兵这么一冲，姚文元这么一保，朱永嘉被解救出来，反倒“逼上梁山”了。再说，他有了那么硬的后台，就在复旦大学宣布造反了。从此，整个“罗思鼎”小组在复旦大学和郭仁杰联合起来，一起造复旦大学党委的反，同时造分管教育的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的反。他们在复旦大学造反后，感到市委写作班再也不能象目前那样为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了，他们共同商量以后，决定杀回市委写作班，敦促我起来造反。因为他们的造反范围毕竟只能在复旦大学，而我如果能带领市委写作班起来造反，将会在全市和全国造成较大的影响。

但是，我当时对造反仍是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上海市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过程中，包括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中，整体是站在革命方面的。我觉得：市委主要领导从柯庆施到后来的陈丕显，作为第一书记都积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陈丕显还参与领导了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讨论，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周总理也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这样的市委如果要造反，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

第二，一九六四年我从市委宣传部调到市委写作班以后，市委对我非常重用，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由于我参与创作了话剧《年青的一代》，撰写了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出版

了散文、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又写出了一批评论文章，市委就指定我和黄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访问越南，见到了胡志明主席。我从原来的副科长，变成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从原来宣传部文艺处的一般干部，变成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让我参加重要的会议包括列席市委常委会，让我出席上海市的国庆宴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上海市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市委又让我以“丁学雷”的名义，代表上海革命文化界做了长篇发言。市委对我的确不薄，如此重用，我不能忘恩负义，感到一下子难以和市委决裂。写作班的大量批判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界、文艺界都知道徐景贤是写作班负责人，又是“丁学雷”的头。我对自己已经到手的一些既得利益，舍不得丢掉。

第三，长期以来党内有一种思维定势：群众运动起来以后，牛鬼蛇神必然要自己跳出来，当时的市委领导也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也好，全国也好，要抓他几十万个右派。我担心，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像反右派那样，先发动大家鸣放、造反，到最后来一次总算帐和大反击，抓一大批右派。如果谁带头的话，说不定将来会划成右派或者什么分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北京的蒯大富等人不都被说成是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了吗？我经历过反右运动，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一直是心有余悸的，这也是我对造反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状态的原因之一。

第四，十多年来党一直教育我要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因为我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更觉得要注意保守党的机密，注意党内外有别，注意一言一行的影响，顾及党的利益。至于首脑机关像省、市委这一级能不能造反，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市委的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这些观点。长期以来共产党的教育所灌输的这些观念，更使我变成了党的“驯服工具”，所以，在造反的问题上顾虑重重。

由于我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郭仁杰就和朱永嘉以及“罗思鼎”小组的几个人，多次到武康路二号来找我谈话，反复强调他们已经豁出去了，没有再回头的可能了，你呢，直到现在还没有亮出旗号来。“我们现在需要一面从市委里面杀出来的旗子”，这是郭仁杰的原话。他还说，你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只能到静安公园看看大字报（市委在静安公园搭了一圈很大的大字报栏，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贴在那里），但公园里两派的观点都可以贴出来，看不到尖锐性、揭露性的大字报。你有没有看到学校里那种如火如荼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最后，他动员我到复旦大学去“留学”。

那几天，正好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急着找我，要我去给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我就给写作班的值班人员作了布置：凡是市委通过保密的红机子来电找我，就说我外出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其实，我真的到复旦大学“留学”去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郭仁杰等人陪我一起观看了复旦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复旦大学的“南京路”全部被大字报贴满了，一直贴到学生食堂。那些大字报确实与静安公园里的不一样，学校的情况与北京的文革运动互为呼应，首都来的消息非常多，大字报对市委的批判一针见血，使我受到很大震动。看完大字报，郭仁杰、吴中杰、朱永嘉又陪我到朱维铮住的第六宿舍日本式小楼前的院子里小坐喝茶。郭仁杰是“红革会”的顾问，吴中杰是“红三司”的智囊，他们都算是复旦大学教师中的老造反。吴中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他的妻子高玉蓉参加过市委写作班，所以和我相熟。他们几个人就轮流劝说我“揭竿而起”。

之后，郭仁杰等又陪我到校园里第一教学楼的大教室里，向我介绍认识了“红革会”的负责人马立新、劳元一，“红三司”的负责人安文江，他们现身说法，讲了自己当初怎么受压制、后来怎么起来造反的历程，还送我两句话：“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他们说，我们红卫兵本来感到北京那么遥远，党中央那么遥远，但造反以后，到北京去，毛主席接见我们，做我们的红司令，给我们作指示，指挥我们战斗，我们就觉得毛主席特别亲，假如你老徐起来

的话，你一定也会有这样感受的。看了他们的大字报，听了他们的介绍，又想到姚文元这次来电话给我们撑了腰，我开始有所触动了。在一千二百号楼的教室里，我和哲学系、中文系正在开会的红卫兵们见了面，听了他们的发言，我也作了一个简短的表态，我说自己是到复旦大学来“留学”的，复旦大学确实像“解放区”一样，红卫兵小将就像高尔基所说的，是暴风雨行将来临前的海燕，我要虚心地向你们学习。

#### ◇ 写作班开会对我“逼宫”

从复旦大学回来以后，郭仁杰、朱永嘉催促我召开写作班全体成员会议，讨论我们面临的形势和应该走什么路。就在武康路二号二楼的玻璃棚洋台上，写作班的全部成员十多人一起开会，发言非常热烈。这些成员分别来自高等院校、文艺协会，电影系统和社科院、党校等，只有我一个人是市委机关的。大部分人的发言是劝说我、启发我，也有人的发言是炮轰我、对我“逼宫”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争取我呢？因为如果写作班从市委机关里杀出来造反，其中连一个市委机关的带头人也没有，对外就算不上市委机关内部造反。而且我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又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我能起来反戈一击，对上海市委将是致命的打击。郭仁杰在会上一定要我下最后的决心，他分析形势说，我们写作班何去何从？现在是关键时刻，关键的关键是看徐景贤怎么样。他还指着我说，你要触及灵魂，不触及不行，这样才能割断和市委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在促使我决心造反的过程中，郭仁杰起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影响我比较大的两个人是朱永嘉和程绮华。朱永嘉当时给我分析，我们写作班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张春桥、姚文元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后一阶段，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中央文革去了，我们在市委控制下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基本上都是充当灭火器、挡箭牌。朱永嘉说徐景贤既不同意市委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北京红卫兵和上海造反派的一些做法，说我是折中主义。朱永嘉还“现身说法”，他说：我这次站出来是靠张、姚，没有他们的担保，我是出不来的。现在写作班没有别的路好走，看样子只有走造反这条路，靠市委靠不住，只有靠张、姚，靠中央文革，靠毛主席。

程绮华是一个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她是从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到写作班哲学组来的，为人正派，我比较信任她。她因为经常去市委党校，对外面整个大气候感受较深。她当时也对我作了帮促发言，她说我们后期实际上执行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你还为曹荻秋写检讨。她说你想想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你本来是写大批判文章的，现在去给曹老头写检讨，你不是变成资产阶级保皇派了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两种选择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程绮华等人直截了当地说：“丁学雷”被你糟蹋了！你还打着“丁学雷”的旗子，“丁学雷”现在究竟做点什么事情？

当然，他们的发言虽然尖锐，还是说理的，我比较听得进去。也有人的发言那就毫不客气了，简直是指着鼻子痛骂。骂得最厉害的是历史组的王知常，外号“小老王”。他原来在南京军区当兵，后来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了调干生，所以年龄比较偏大，戴了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头顶都有些秃了，朱永嘉当过他的老师，但两个人年纪相差不大。王知常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当教师，主攻近代史，知识面比较广博，记忆力特好，调到写作班历史组以后，我称他为“万宝全书缺只角”。这次在复旦大学冲击会场、解救朱永嘉的过程中立了功，就摆出一副“老造反”的架势，说起话来霸气十足，他在会上站起来冲着我说：“要说造反，我们造得最早，批《海瑞罢官》就是造反，我们不是比聂元梓还早吗？可是，你这个支部书记把写作班带到哪里去？后来，我们整天在市委门口值班，遭人围攻，历史组被抄，朱永嘉被绑，整个写作班成了市委的挡箭牌、消防队。你这样做对得起谁啊？对得起春桥、文元同志吗？对得起我们吗？你再这样‘老保’下去，我们一拍两散，对不起，只能在对你的批斗会上见！”说罢，他还气得双脚在地上跳了跳，把楼板踩得咚咚作响。我只好听任他“发格”，埋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当时，

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触灵魂”，听王知常这种发言，可以说是真正的“触灵魂”了。

这样，十多个人人人都发言表态，一圈兜下来，局面比较明朗了：写作班的历史组、哲学组全部主张造反，文学组的陈冀德、吴圣昔等赞成造反，作家协会来的吴立昌和电影厂来的刘景清开始时不赞成造反，主张继续写文章，后来看到大势已去，就保留自己的意见。最后，就等着我一个人表态拍板了。

#### ◇ 我终于下决心和市委决裂

写作班的会议持续了两天，第一天开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上午、下午、晚上一直开到下半夜两点多钟，连续对我“炮轰”。伙伴们要我狠触灵魂，有的人演“红面孔”，有的人扮“白面孔”，分别对我又劝、又逼、又拉、又打，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敦促我决心打出造反的旗帜。

经过两天的帮助，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会议结束后通宵不眠，反复思考利弊得失。我顾虑党的机制还是强大的，万一自己出头露面和市委对抗的话，风险很大，将来可能会有很糟糕的下场，我这十几年来在市委机关里所做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既得利益不去讲了，自己的声名也毁了，所以总是难下决心。但是另一方面，从我多年的感受来看，我对当时党内的很多情况相当不满意，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对党内的特权思想不满意。斯大林逝世以后，揭露出苏联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大搞特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除了住宅以外，都有别墅，带了家属一起度假，大搞特殊化。我认为中共在建国以后，和苏共的情况差不多。我有机会受上海电影制片厂之约，外出访问写电影剧本，又受上海《解放日报》的委托，让我做它的特约记者，到外地采访写报告文学。我到过云南、四川、湖北等地，又去过杭州、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城市，发现这些地方的党委都建造有高级的招待所，专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负责人居住，这些招待所占有最好的地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四周都有广袤的园林，首长和他们的家属在这里休息宴请，或是小病大养。招待所备有大批的服务人员为首长们服务。所有的高级招待所都是警卫森严，老百姓连接近一下都没有可能，更不用说打听内情了。上海在这方面也决不后人，除了专门建造的给中央首长居住的四一四招待所和四一五招待所以外，还有虹桥俱乐部、兴国路招待所、瑞金花园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岳阳路招待所……有一个市委的领导人生了病，就占用了西郊的最好的招待所，还为他专门进口了最好的医疗设备，组建了最强的医疗班子。这些特权阶层的享受和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以，毛主席提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是：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进城后脱离群众了，工资高，有洋房，有汽车，有服务员和厨师，贪图享受，而且对群众摆架子，群众对他们心里有气，所以要冲击他们。这些话我最听得进去。

其次，我对党内的等级制度不满意。长期以来，我感到党内等级森严，什么东西都要讲等级。我结婚时申请住房，先是叫我们住到部长家后面的仆人住房里去，只有六平方，没有窗户，进出还要走仆人的专用楼梯，我很生气，拒绝接受。后来，分配给我的房子非常小，因为当时我还不是科级，不能住稍微大一点、朝向好一点的房子。夏天热死，冬天冷得要命。明明其他房子都空着，但因为级别不够，就不能分给你。而那些部长们，则住着成套的大洋房，还有花园，我为此愤愤不平。举凡衣、食、住、行，都要讲等级，食堂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甚至发展到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等级。我想：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厉害。所以，当毛主席号召要反对党内的不平等作风，主张上下级平等、官兵平等的时候，张春桥跟着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鼓吹军事共产主义的好处，历数等级制度的弊病，我是十分赞成的。

除此之外，我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市委的表现更不满意。这个市委自恃一贯革命，一贯

正确，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抱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市委又把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人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把我们作为挡箭牌和灭火器。市委领导人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而自己却想蒙混过关。我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我通宵不寐，反复考虑，觉得自己对这个党、对上海市委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应该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等好好地焚烧一下，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特别对那些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来一次冲击，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 姚文元是写作班“全民造反”的靠山

在思想上逐步想通以后，我的心里还是不够踏实，因为写作班的重大行动还没有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首肯。所以我决定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汇报一下。我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我给姚文元打了几次电话后才打通，我将写作班开会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说我们写作班打算起来造反了，征求春桥同志和你有什么意见。

姚文元听了不直接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只是说，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赞成的。他不用“造反”而用“革命”两个字，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们始终要把矛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提到中央在开过工交座谈会，马天水代表上海市委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使生产都受影响了。在这个会上，马天水受到了林彪的严厉批评，张春桥做了马天水工作，动员他不要与市委持同样态度，应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会对生产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姚文元说，从中央工交座谈会看出，上海市委对文革的态度是错误的，对待群众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他的意思是市委那段时期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压制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造反。所以，他提醒我要把矛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说要争取马天水，让马天水从市委里分化出来。另外，他告诫我要多注意做舆论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上海刚刚发生过《解放日报》事件，即“红革会”要求把他们编的造反报纸《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解放日报》不同意，红革会就冲击并占领了《解放日报》社，使《解放日报》停刊几天，“工总司”又冲进去支持红卫兵，事情闹得非常大。上海当时分成两大派，一派要看《解放日报》，一派要看《红卫战报》，前者是多数人，后者是少数人，分头在全市游行、发传单。事情来得比较突然，老百姓说：《解放日报》是党报，为什么要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从群众的舆论看是大部分人不支持这个行动。姚文元大概感觉到这是个问题，所以他指导我说要多做舆论工作。实际上他是为我们出主意，我们如果“揭竿而起”宣布造反的话，在舆论方面要做得周到一点，争取群众。

在打出造反的旗帜之前听到姚文元的表态，我就放心了。我想：他们现在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们同意我带领写作班和市委决裂，我就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和靠山，足以抵御市委的压制和打击了。与姚文元通过电话以后，我正式召开写作班的全体会议，宣布我接受大家的批帮和督促，正式决定造反了。我向大家传达了和姚文元通电话的内容，并说希望写作班全体造反，不要像别的地方形成两派。会上大家赞成我的意见，再也没有人说不要造反了。接着，大家继续讨论究竟用什么方式亮出我们的旗帜，这就具体进入到写作班造反

的筹备阶段。

关于市委写作班全体造反的问题，当时和事后有一些造反组织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单位是全民造反的。人们的认识不一致是正常现象，所以各单位也不存在统一行动全民造反的现象，因此有的组织曾经说你们写作班全民造反，肯定是假造反，哪一个单位是全民造反的？实际上，写作班的造反确实是一个特例：写作班的地位比较特殊，张春桥曾是写作班的直接领导，姚文元又在写作班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们两人现在又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组员，就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写作班和他们有这样的历史渊源，现在他们真正成了写作班的背景和后台，因此当时大家最后都赞成举旗造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宣布造反、向市委开火了。我们议论了多次，觉得市委写作班的造反和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不同，应该揭露出市委机关的内幕，亮出那些市委领导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暗箱操作”压制群众运动的真相，方能震动全市，并取得各路造反派的信任。这个揭露和反戈一击的任务，首先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因为我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又是“御用”的市委写作班子的头头，一向受到市委的信用，还可以列席市委常委会，了解许多党内机密，所以我如果能站出来和市委决裂，在全市将会起到重大的影响。所以，郭仁杰、朱永嘉等人建议说：你要准备一个重点发言，在全市人民和机关干部面前亮相，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十几年来一直在市委工作，也只有你有条件作这个发言，你抛出这个“重磅炸弹”，才真正是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了。

但是，光是我一个人代表写作班作重点发言还显得有点势单力薄，我们觉得应该联合市委机关内的其他造反力量共同行动，才能造声势。据我们了解，当时市委机关内部也有一些小组、小派别起来造反，比如复旦大学“红革会”支持市委办公厅下面的党刊编辑部的革命造反战斗队，造了《支部生活》领导的反，后来又宣布要造市委办公厅的反，但他们始终在机关内部活动，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市委教卫部、宣传部和市委党校也有少数人跟外面串联，但都没有打出过旗子。红卫兵们向我们建议，你们写作班要把市委机关里各部、委、办的造反派都串连起来，各自准备自己部门的发言，然后开一个万人以上的大会，可以放在文化广场开，正式宣布从市委机关内部杀出来直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样就轰动了。以前上海还没有一个造反组织能够把市委主要负责人统统叫到会场接受批判，他们开会批的都是个别领导人，比如复旦大学要批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就把杨西光叫去批判；工厂里要哪个工业部部长到场，就通知部长去。市委书记处书记很少去哪个会上听意见，第一书记陈丕显更是以生病为理由从不在公众场合露过面。市委机关干部如果打出造反旗帜，一定要把市委书记、市委常委特别是市委第一书记叫到会场来听取批判，这个影响就大了。

我对这样的建议很听得进去。我曾经参加过很多红卫兵召集的会议，看到过他们的批判架势，感到他们有经验，唯一不赞成的是他们动手武斗，揪头发，搞“喷气式”。关于他们提议的要把所有市委书记、市委常委都叫来挨批，我想只有我们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的书记、常委们都已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东躲西藏，而他们的藏身之所只有我们这些机关干部知道，如果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开会，他们是躲不过去的。我觉得红卫兵的主意不错，我决定采纳他们的建议。

（未完待续）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

【千秋功罪】



## 我父亲王飞不后悔被定“林彪死党”

• 王鲁宁 •

◇ 林立果的“小舰队”：那个词本来是开玩笑

我也没准备，原来就以为空军的几个子弟聚一聚，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有一些话现在还不好说，还不敢说。但是我想有一些事，既然是这种座谈，也想说一说。

我父亲王飞“九一三”时是空军副参谋长兼党办主任，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这些人的直接领导。我“九一三”时在部队，是武空13师飞行员，是运输机的副驾驶。

我听到传达的时候感情肯定跟在座的不一樣，因为这些人都是我身边的人，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叫着周叔叔、叫着小于叔叔，叫刘沛丰是刘叔叔，就这样长起来的，他们怎么变成了什么“十恶不赦反革命”，要“谋害毛泽东”什么的，简直不可思议。我对这些人的印象，跟大家听到传达文件是不一样的。像林立果1967年从北京大学入伍到空军以后，当时我只知道空军来了一个挺能干的吕秘书叫吕果，我们以前听说、后来也听到一些情况，都是说很平易近人，很有一些进取心，愿意学习什么的。当时我父亲觉得不好安排他给某一个首长当秘书，所以说就让周宇驰带他，叫“一帮一”，让他们组织一个调查研究小组，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就跟他说部队里边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你们先去调研一下，查一查前因后果，提出一些改进方案什么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什么“新三军”、“老三军”斗争比较复杂、比较激烈，他在当中都见识到了，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我父亲讲，“小舰队”那个词，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就是党办这些人在一块聊天吹牛的时候一句玩笑话，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核心力量”、“核心组织”了。当时西郊机场有两架飞机要上广州，后来就是凡是上了飞机那个名单的，就都是“死党”了，当时就是这么给框的。按这个框，我父亲因为正好是林立果他们的顶头上司，所以说给他定“林彪死党”——他觉得也不冤，确实他跟这些人很熟悉，这些人想搞一些什么，他说我都听到了，或者说我也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现在跟我们聊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个“九一三”、这些人实际上应该分成两块，黄吴李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可能是对林立果他们，对《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些事情确实是不知，是被冤枉的。我的感觉，像周宇驰、于新野、林立果他们那一块，经常通过调研小组发现一些问题，通过自己认真思考分析，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矛头指向了“文化大革命”、指向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后台是谁？一目了然。

◇ “不解决毛泽东，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

所以说这些人最后的仇恨——当然我说的“仇恨”也是一点一点地认识——就觉得不解决毛泽东，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就认为“文革”就是中华民族的……那个时候“浩劫”这个词没出来，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要想制止这场灾难，那不得不采取一些现在认为不可思议的行动。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可能就是在他们几个人当中出来了。

我们也是跟我父亲聊天聊到这个事，他讲《五七一工程纪要》在“九一三”之前他都没见过，是在进了学习班以后，给他看那个影印件他才知道。他一看完这个，说我相信这个肯定是真的。于新野的字他很熟悉，另外平时说的一些话，他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些内容都说过，所以他认为是真的。但是这个里边后来讲到什么要谋杀毛泽东之类，这个问题，他觉得肯定林彪

不会知道这些事情，黄吴李邱也不会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像空军吴司令员在九届二中全会被批以后，很多事情上边都那么关注了，底下的一些事情怎么还敢向他汇报、对他交待？不可能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算是给黄吴李邱一种解脱，他们实际上没在一块。

我父亲卷入“九一三”，比较关键的就是因为周宇驰在直升飞机被迫降以后，撕掉了手里的两张纸，一个是林彪手令，一个是林写给黄永胜的一封信，那个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说“有事可与王飞面洽”。我父亲进了学习班以后，人家也是死追这封信：你跟黄永胜最后怎么“面洽”的？你向黄永胜交待一些什么任务或者什么事情？

我父亲讲，林彪这封信也是他后来进了学习班以后才知道的，事先他并不知道。“手令”他说也不知道，我说那不可能，我听传达文件，里面有你写的“王飞笔供”，都由你亲笔签字的，你的字我也都认得。他讲，他说的有一些内容是不得已，当时纪登奎、郭玉峰给他讲这些事、让他写这个“笔供”的时候，起码是跟他说了八九遍，他说跟小学生听写似地写了“笔供”。里边有多少不实之词我就不说了。

我父亲1981年以后，就算离开秦城了，身体恢复得比较好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他骑车来到钓鱼台，到国宾馆门口时，我说：“你看，那就是钓鱼台，文件上说，你也承认，你当年和关广烈来这里看地形，要组织空司警卫营的人来这冲中南海。”我父亲来回看了半天说：“哟，我今天才知道钓鱼台在这。”他说根本没来这勘查过地形，也没有要冲中南海。当时就是一说，后来任务就解除了，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文件里确实有不真实的地方。林立果他们所谓的“小舰队”和老一辈黄吴李邱是有区别的。公审时老的说，我们都没这些事，一无所知。

◇ 毛真正害怕的是林彪，更害怕林立果

我想毛泽东对林彪是比较害怕的，林彪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死活不检讨，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反毛的错误。底下黄吴李邱，毛泽东压得很厉害，他们又是从小跟着毛泽东搞革命起来的，都是很听话的。所以毛对黄吴李邱是不害怕的。毛真正害怕的，一个是林彪，一个是林立果，更害怕的是林立果。林立果很年轻，不受限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你管得住吴法宪，管不住林立果。当然毛泽东也想管住林立果，我曾问过豆豆大姐，当初干嘛给林立果找对象选妃搞得那么大张旗鼓，现在老百姓一提都非常反感，很愤恨。她说，就是毛泽东提出来要给林立果找对象，林和叶才害怕了，赶紧说空军谁有合适的，赶紧给找一个，千万别用毛泽东给安排的那个儿媳妇。林立果调研小组成立以后，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应该说他们顶多到叶群那儿，叶群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共同蒙蔽了林彪。否则不可能叶群接周恩来一个电话，就那么仓惶地上飞机了。现在的谜团简直太多了。包括刚才张大哥（张清林）说的李文普那一枪。

我问过我父亲，他那时思维还清楚，他说“九一三”事情出来以后，他正好在指挥所，他说飞机走了以后，他们几个人轮流看着标图员标的航迹线向李德生汇报：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李是周恩来派他到空军的。我们的雷达因为有限嘛，出了国境以后飞机就消失了很长时间，雷达就搜索不到目标。我父亲就跟李德生讲，现在雷达全程开放，能不能除了值班雷达开放，其他雷达就请示关机了。李德生说，我不懂你们空军的事情，像你们自己的事情该管就管，这种事不用向我汇报。我父亲听了这种话以后。就还想听情况，就像贺铁军刚才讲的：空军截获了一个情报，因为间隔时间比较长了，递上来时，三分情报变成一份情报了，就是：“大型目标入侵；大型目标着火；大型目标坠毁。”我父亲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在目标消失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后，情报就传上来了。别人可能不太清楚飞机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我父亲说他都猜到了，他说林彪一家包括林立果都在飞机上，这个飞机在天上就着火了，然后就坠毁了。他就想象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情况转给李德生。他把这个情报就退给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他说既然李德生说了，你们空军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就不用事事都请示。这件事就等

于给瞒下来了。后来中央文件编的故事说，飞机迫降爆炸起火。我父亲讲，他心里很明白空中已经着火了，空中着火了以后，飞机才迫降的。

◇ 林立果和同伴不是凶神恶煞的法西斯分子

林彪的飞机为何会空中着火？到现在我和我父亲聊天时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我看到资料、看到书，最可能是两种：

一种是这飞机被人做了手脚——“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被炸时，安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微型炸弹，只要把油箱炸开，在油箱附近，这个飞机就得着火。当时“克什米尔公主号”因为是在海上，就让它慢慢自己烧着，或者在哪个岛上迫降，或者让它坠海。有的资料说256号飞机在山海关加油当中做了手脚了，所以在天上就着了；

再一种可能，从现在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有可能是驻蒙苏军用什么武器，比较轻型的地对空武器击落的，或者是一个霰弹的碎片碰到飞机，正好碰着引擎就着了。

我问我父亲哪种可能性最大？——只能说是“可能性”，他不置可否。

对于“九一三”事件，我想说两点：关键人物，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不是凶神恶煞的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当时和周宇驰在一块，他很年轻呵，周是党办副主任，穿四个兜军装，他穿两个兜军装，他们俩骑着摩托车到处去调研。人家只知道他是个司机或者是个小兵，跟着首长，去为首长服务。到哪去安排什么活动，他不愿出头露面，都是往后闪。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现在讲他，都以为是提着手枪、凶神恶煞的那种人。周宇驰也一样，面目弄得也是凶神恶煞的模样。50年代末，周宇驰是刘亚楼的秘书，永远是笑眯眯的，一笑两个大酒窝深深的。而且这些人都很能干，能文能武，开汽车，开飞机，1967年《红旗》杂志社论是周宇驰写的，就发表了。我父亲说周宇驰是唐山乐亭人，全村最穷的贫雇农，40年代参军。

于新野8岁就在上海当共产党的交通，最后填档案，何时参加革命工作都没法写，最后填了个12岁，最后到了部队。

刘沛丰，跟着飞机走的那个，我父亲说，刘沛丰刘叔叔那是解放前的正牌大学生啊，很有本事。给我的印象，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文武双全。他们写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除了谋害毛泽东那种提法有些过于残忍，其他的那些分析都是比较准确的。

◇ “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另外我想说受“九一三”事件牵连和影响这个事，波及面太大了，对军队和党的工作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当时我在13师，武汉的部队，也受空军“九一三”的影响。一个13师运输机部队，应该说不受什么影响，我们的师长、政委全都给抓起来了。师长王宏志（音）是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在牡丹江跟日本人学的九九高练的第一批飞行员，开国大典驾驶运输机C46通过天安门检阅的驾驶员，是开辟拉萨航线、飞跃天险的功臣，在青岛抓起来了，拿白布单子给他一蒙，手枪往后腰眼一顶，扣上手铐就抓起来了，从青岛押回武汉。

我们师政委郭学师（音），就因为过去是刘亚楼的秘书、和空军的人关系比较熟，也就被捕了。从副师长到团级以下干部，包括我当时是训练大队，从大队长到大队政委，所有的人全都关起来了。当时叫“学习班”，现在应该叫“双规”，四五个人陪一个，然后门口坐一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守着你那间房门，不许进不许出。我们部队很快陆军接管，连我们大队都是陆军，政委都换成陆军的人。我们师在湖北，调来高炮17军，跑道两头都是，只要飞机起飞降落就瞄，当时只要搞演习，陆军马上就跟你对着干，挖战壕，马上枪对枪。把空军和陆军搞得对立成这个样子，要是擦枪走火，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这些部队战士的基础都是一样的，海陆空军都能认得老乡，最后陆军部队与我们关系非常好，也成了“兄弟部队”了。当时这种部署和安排，用心是比较险恶的。

“九一三”牵涉的人实在太多，太不应该了。像我父亲被牵涉进去，那没的说，觉得给他定“林彪死党”，他自己也不后悔。他1975年、76年就被从卫戍区转到了秦城，他也很绝望。贺部长也被送到秦城，后来听贺部长讲：“我进秦城，听见监狱有人在大喊大叫，我一听是王飞，哦，我不孤独，秦城不是我一个。”后来我问过我父亲，你在里边喊什么呀？人家那都是些小战士，你就不知道给人留下个好印象？您就不能表现得文质彬彬一点，有风度一点？我父亲说，实在是不行，在里边我的监号可能是在最后一个，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政治犯。政治犯伙食有一定标准，应该是不错的伙食，结果到他那什么都没有了，汤汤水水就递过来了，他表示抗议，结果那个小战士说：“你是反革命，给你这些就不错了！”我父亲说：“我不是反革命，我亲手活捉过日本鬼子，你懂什么呀你！”

我们每个季度可以到秦城看他一次，他后来已经不是正常人了，身体非常虚弱，走路、说话都不行了。

1981年7月底。公审林彪和“四人帮”之后，王飞专案组来找我们，说把他“保外就医”，让我们四个子女签字，我们不愿意签——我们在北京没有家，没有住的地方。他们说，你们只管签字，没地方住，我们代表中央，给你们安排一个地方。一个星期之后就出来了。他说出来和进去都感到非常突然。专案组通过海淀区在西三旗给安排了一间农民房，房租我们自己出。

我父亲他们这些人很悲惨，不许叫自己的名字，保外就医化名“王玉”，否则还不让出来。只有叫王玉，药费才可以报销。后来我看贺龙当年也化名王玉，送火葬场，骨灰盒上写着。我问公安部：你们是不是只有一个“王玉”的化名，谁倒霉就安在谁头上？

直到1994年，总政给军委打了一个报告，要把我父亲交给空军。当总政来人和我父亲谈的时候，我父亲说：我王飞就是王飞，绝不叫王玉，你们爱叫什么叫什么吧，我以后一定叫王飞的名字。现在好在他恢复了王飞的名字，否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军委给他一个批覆，安排三居室的一套房子，每月300块钱，看病在空军总院，按照军人团以下干部待遇，免费治疗。三居室安排了，在南苑，很远，不方便。三百元一直到五、六年前，调到一千块钱。他现在床上吃，床上拉，风烛残年，没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保姆市场上，照顾这种人，月薪不低于三千块钱，我们为了提高他的待遇，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写信，提要求，得到的答覆是：“已经处理，不再处理”。

我父亲只是“九一三”受牵连中的一个，现在连对逃荒要饭的、打工仔，报纸都要呼吁提高人格尊严，送温暖，但是“九一三”这批人枪林弹雨做过贡献，又有谁关注过？我父亲已经四次脑出血，人已经不行了。我想呼吁，还有一大批“九一三”事件的受牵连者，应该改变他们的处境，给以人格的尊重。

□ 摘自作者博客

~~~~~  
【史海钩沉】

## 造反派的末日

• 叶曙明 •

1968年6月30日，几名广州造反派的头头，到北京参加全国造反派的联合会议。7月17日，从全国各地来的造反派还包括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等，全都是最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关于会议的内容，从后来中大八三一的一位头头的揭发中，可见概略：“整个（会议）过程就是讲中央怎么斗争，如何激烈；各地的革委会怎样犯错误；军区如何支保；造反派怎样受压。”

会议最关键的议题是：成立名为“全国造反派总部”的全国性统一的造反派组织。这是中央绝对不能容忍的，曾三令五申，不准成立全国性组织。一旦出现这样的苗头，也就是造反派覆灭之时了。因此，中央决定对造反派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广西问题，发出著名的“七·三布告”。广西问题与广州密切相关。东风派与广西联指、湖南高司、武汉百万雄师、河南造总等群众组织观点接近，而旗派则与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等群众组织接近。7月6日，广州的街头巷尾，哄传中央将广西“四二二”定为反革命组织。地总的高音喇叭，彻夜欢呼。

7月8日至10日，省革委会召开第八次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市革委会常委、在广州的委员和军队参加三支两军各方面的负责人。第一天的会议是学习“七·三”报告。第二天，刚从北京回来的孔石泉、黄荣海和陈郁、王首道、阎仲川、白平等参加了会议。阎仲川在发言时说：“现在少说废话，讲抢车的事吧！600多辆汽车被抢了，很多破坏了，这是明摆着的。就是有些人对革命委员会的话不听，对中央的话不听，对毛主席的话不听。我们到底要不要对全省4000万人民、广州300万人民负责？我们说了就要做，不要做两面派！”

阎仲川接着又说：“我建议先解决广州的问题。怎么办？交通中断、制高点占领、抢车、抢枪、殴打绑架、杀害解放军，是否这样下去？……现在还抢车，你们是不是中国人？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有些组织不表态，暗中支持，占了粮食局，破坏粮食供应，还派人去表示支持。对广州目前的情况，参加会议的群众组织都要表态，参加会议的常委都要签字执行。”

会上两派组织的代表又互相指责起来。这时军队和革委会已明确表示了反对旗派的态度。阎仲川命令旗派设在三元里的关卡在12小时内拆除。“不拆，我们解放军把它消灭掉。”一位军队代表说。

孔石泉说：“现在还有人暗中支持占领制高点。外地来广州占领制高点，它干扰了广州文化大革命，搞武斗，打、砸、抢，这是什么人，这是为什么？……对社会上的人，同志们要好好调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陈郁说：“有一些人，甚至是农垦厅的干部，不防洪，还把车抢走搞串联，抢防洪车，这个人要枪决！”孔石泉接着说：“应该斗，应该游街。”陈郁愤怒地说：“轻了，我说要枪决他。”

旗派工革联的代表在会上被要求“统统站起来，都要表态”。红旗工人的头头在会上带头做了检讨。会议最后通过了广东省革委会的一份文件，省革委会委员一一排队签名。

7月5日，一辆正在南站市一中附近执勤的军队小汽车被抢。7月8日上午，驻南站解放军执勤分队奉命追回被抢汽车，在黄沙大道上遇上市一中的学生正驾驶着那辆汽车。小分队令其停车，将车收回，随即返回南站驻地。但当他们走到南站大门值班室附近时，被南站、市一中、市运二车队上百名群众截住，他们高呼：“南站是我们的，不准你们进去！”站内响起了钟声、哨子声，又有几百名群众闻声赶来，把24名军人团团围住。

混乱中，军人三次鸣枪警告，但未能驱散群众。大部分军人都被打伤。群众把负伤军人架到南站大门外，然后用车辆把大门堵死。这时，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双方在雨中对峙，长达六个小时。7月8日，广州市郊区东方红公社罗村大队，围攻、殴打、捆绑郊区革委会和解放军派去该地调查武斗情况的人员，连汽车也被砸烂。

7月24日，中央发布一个针对陕西问题的布告，但实际上，和“七·三布告”一样，是向造反派发出的最后通牒，全国各地都适用。7月25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温玉成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周恩来严厉斥责了广西“四二二”造反派：“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掠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

周恩来批评旗派到北京开会，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他们说什么黄永胜同志到北京来了，他们也来北京，这是借口。他们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对坏人的阶级感情却那么深。中央点名的，他要辩护，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还开黑会。”

中央对广西问题的表态，不啻一纸判决书，宣判了广州旗派的“死刑”。自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之后，广州军区便放弃了所谓“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对造反派实行坚决镇压。军队接到命令，在受到造反派攻击时，可以开枪。一位在军管会工作的军队干部说：“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造反派就老老实实了，你不听话的，真抓；你要敢动武的，真打。造反派都非常现实，过去放纵他们，他们当然厉害了，你不放纵他们，他们最老实了。”这时，造反派已经处于苟延残喘的处境了。

□ 摘自作者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